

漂泊的黄昏

时钟的指针指向下午5点。55岁的金秀琴利落地换下胸前印着“GAP”的粉色家居服——那是女儿穿腻了原本想扔掉的衣服。她穿上自己的红短袖，抓起一个尼龙袋，把穿着肉色丝袜的脚蹬进黑色平底鞋，快速按下昏暗楼道里的电梯按钮。

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，这双平底鞋匆匆穿过狭窄的胡同、低矮的居民区，穿过汽车、自行车、行人和宠物狗，停在一家幼儿园的3楼。对于金秀琴来说，这段路是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熟悉路线。5岁的外孙手里举着一块饼干，已经等了一阵子了。她掐着表算，接到外孙后要送他去上半小时的辅导班，然后必须在7点之前做好晚饭。离家之前，她已经把豆角择好洗净，只等下锅。5年前，为了完成这些“任务”，金秀琴离开生活了50年的东北铁岭。

在学术界，这些跟随子女从外省市的农村或城镇到现居住地短期或长期生活的、非本地户籍的异乡老年人，被称为“老漂族”。国家卫计委发布的《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》显示，我国流动人口将近1800万，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老人比例高达43%。

表面上，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普遍而自然的一部分。但他们并不属于这里。这些老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子女所在的都市，在每天的黄昏中奔波忙碌，也在一生的黄昏中漂浮不定。

周期循环的分合

【“这是他们的家，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。”】

相比热闹的黄昏，老人们的清晨要落寞许多。

早上5点，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，他们几乎同时醒来。从陈显兰的房间向外看去，北京京通快速路上的路灯还在灰蒙蒙的空气中亮着。这是一套两居室，她轻轻走到女儿的房间，给外孙女喂牛奶、换尿布。外孙女现在一岁多，年纪跟陈显兰来到北京的时间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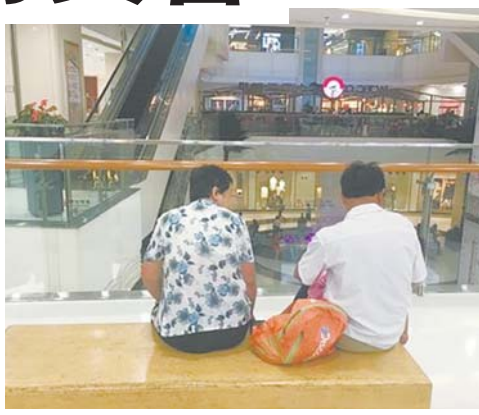
客厅里没有窗子，黑漆漆的。她把自己关进厨房，在锅里加上水和小米，放在火上温吞地熬着。按照河南老家的习惯，早上她通常会炒几个菜，“吃不惯这边的咸菜”。

一年半以前，62岁的陈显兰在老家接到女儿电话的时候，同样在做饭。在滋滋啦啦的油锅旁，她听见还有两个月就临盆的女儿说自己要上班，没有时间洗衣做饭，想请她过去帮忙。放下电话，这个朴素的农妇心里有些高兴。从女儿上大学开始，母女俩已经有10多年没长期在一起生活了。孩子要强，从来没让父母担心过，可这一次，身为母亲的她也有了一种“被需要”的欣喜。那个春天，陈显兰和老伴连夜给地里种的大豆浇水，第一天浇到夜里11点，第二天浇到凌晨2点。几天后，她把两身衣服塞进一个小箱子，一大早就站在村头，等着开往郑州的大巴。陈显兰晕车，在两个小时的车程里，她吐了好几次。

金秀琴清早的锅里同样翻滚着米粥。她习惯把洗干净的鸡蛋跟粥一起煮，鸡蛋是她特地从老家带过来的。在老家，她原本养了10多只鸡和五六头猪，临走



老人正在接刚放学的孩子回家。



两位老人带着孩子在商场玩耍。

前全部卖掉了。老伴虽然不跟她一起来，却也要四处打工，无暇喂养它们。5年来，她每次来北京，都要带上剁好的排骨和鸡肉，分成几部分装到小袋子里，跟干豆腐、鸡蛋、蘑菇、咸菜一起装进大纸箱，拎上火车，“都是孩子爱吃的”。她相信一切东西都是老家的最好。

62岁的田慧芬和63岁的程丽云分别从哈尔滨和大连来到北京，为儿女照顾下一代。至今已经有10年。她们来的时候连箱子都没带，就背了一个包。两位老人互不相识，却说着一样的话：“这是他们的家，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。”

学者潘永康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发现，在传统社会，中国家庭的生命周期特点是：年轻人婚后先与父母同住，等自己有子女后与父母分开，在子女成婚后又与父母同住，最后再分开，如此周期循环。其中，婚后与父母同住的主要考虑是住房，由于父代通常先拥有房子，合住是“子代投奔父代”的选择，体现出“父代权威”的代际关系模式，父代是家庭的投入和决策重心。

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伟进指出，当前人口流动性增强，婚后同住的可能性变小，再次同住的重要考虑是父代帮忙抚养孙代，这个时候，合住是“父代投奔子代”的“子代权威”代际关系模式，家庭投入和决策的重心倾向于子代。

新时代的“母亲”

【有研究显示，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，女性占比更大。成为母亲几十年后，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“母亲”的角色。】

7点左右，天完全亮了。早上是很多家庭分离的时刻。粥已经上桌，旁边摆着地瓜、油条、馒头、咸菜或炒菜。要上班的匆忙吃了几口就出门了。金秀琴和田慧芬要送孩子去上幼儿园，程丽云送孙女上小学。陈显兰把一岁多的孩子抱在怀里，看一眼时钟，又快到了哄她睡觉的时间了。

在来北京之前，这些老人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长期生活。陈显兰原本打算等女儿出了月子就回去，金秀琴想的是就待一两年。可是因为“没办法”，她们全都一直待到了现在。有研究显示，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，女性占比更大。成为母亲几十年后，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“母亲”的角色。

白天的大部分时光，陈显兰

都要跟一个婴儿一起度过。刚开始，她不习惯给孩子用尿不湿，“那么包着孩子能舒服吗？”在她的3个子女还是婴儿的时代，这个母亲都是用尿布，然后在下面

“金秀琴清早的锅里同样翻滚着米粥。她习惯把洗干净的鸡蛋跟粥一起煮，鸡蛋是她特地从老家带过来的。在老家，她原本养了10多只鸡和五六头猪，临走前全部卖掉了。老伴虽然不跟她一起来，却也要四处打工，无暇喂养它们。5年来，她每次来北京，都要带上剁好的排骨和鸡肉，分成几部分装到小袋子里，跟干豆腐、鸡蛋、蘑菇、咸菜一起装进大纸箱，拎上火车，“都是孩子爱吃的”。她相信一切东西都是老家的最好。”

垫一小块毯子，再下面铺一层油纸。她也不习惯婴儿的饮食。绿的青菜、红的胡萝卜，甚至猪肉都被打成泥状，五颜六色地装在一个个透明的小玻璃罐里。在她印象中，自己的孩子都是用白白的馒头喂大的。但是几个月后，陈显兰慢慢学会使用带遮阳篷的婴儿车，每天在固定时间给孩子喂食各种营养粉调成的“辅食”，也知道在递给孩子食物前要用湿巾擦手。金秀琴被告知孩子在家的时候不能看电视。田慧芬学会了喝水时嘴唇不接触杯沿，因为女儿告诉她不能跟孩子用同一个水杯喝水。这些母亲正在重新学习，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、新时代的“母亲”。

“外地人”

【那里有老伴，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，有退休前的同事们，还有“自由”。】

比起陈显兰，外孙已经上幼儿园的金秀琴白天更难打发。这几年，她发现周边有几处可以做免费理疗的地方，几乎每天都去。她们似乎很快适应了北京的生活。来到北京第二天，金秀琴就找到了离家最近的菜市场，她知道哪家的豆角、茄子、辣椒、白菜最便宜、最新鲜，也知道小区里仅有的几张长椅和健身器材的位置。

大多数时候，她们的活动范围只是周围两公里之内。陈显兰从来没有自己坐地铁出过门，也

“不想学”。最远的一次是带孩子去了一公里外的大学校园。有时跟老伴一起，带着外孙女去商场玩，也从来没买过任何东西。

田慧芬一个人的时候最远去过旁边的森林公园，那里每天晚上都有老人挽着手跳交谊舞，她喜欢看，自己却从来不跳。有的老人酷爱下象棋，到北京10多年每天晚上都背着手看别人下，自己从来没下过，居委会组织的各种活动，也从未得到通知。还有老人喜欢坐公交，绕着北京城一圈一圈地转。

程丽云不喜欢坐公交。她不喜欢上车时自己的卡只会发出“嘀”的一声，而没有跟着一句“老年卡”。有时车上会低低地传来一声“外来的”，她心里落寞，却又愤愤不平：“要是我儿子没能耐，人家会请他过来？”金秀琴楼下的清洁工会拖着长长的儿化音跟她说，“外地人怎么着也不如北京人”。陈显兰只会说河南话，有时跟北京老人搭话时，对方直接说自己“听不懂”。“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，也不接受这座城市。”陈显兰的女儿说。

每周六的下午，程丽云都要带孙女去上绘画辅导班。上课期间，程丽云就坐在教室门外的沙发上，翻看微信朋友圈。有人给她发过一段文字：“不见孙子想孙子，见了孙子怕孙子；小孙子吃喝拉撒忙坏了老孙子，老孙子手忙脚乱还照顾不好小孙子……”她觉得很有道理。

“配一副眼镜要两千块钱，三四百的不一样吗？”报的辅导班有钢琴、绘画、英语、奥数，每套课程至少六千元。“太贵了。一个女孩子，要那么拔尖干什么？”程丽云叹了口气，又有点自豪和心疼，“她是校田径队的，钢琴已经过了八级了，游泳会四种泳姿，绘画也正在考六级。孩子那么累，我也舍不得。”

孙女受不了程丽云的“过分节俭”和“唠唠叨叨”。奶奶在说话时，她会一脸无奈，跟旁边的同学说：“真服了我奶奶了。”她也不喜欢奶奶洗的衣服上有八四消毒液的味道。她常说：“我跟奶奶不在一个频道上。”每当这种时候，程丽云就想回老家。

金素琴也想家。她老家在铁岭农村，来北京之后院子里啥也没种，只是地里还种着玉米。去年过年，她回家待了不到一个月，每天傍晚拿着扇子跟同村的人一起扭秧歌，从5点一直跳到8点。

“家门口那条街从南到北，大家都认识。”她喜欢老家敞亮的门厅和院子，“一开门就上街

了，多方便”。她不喜欢住带电梯的房子，和七拐八拐的楼道。

田慧芬在哈尔滨的家只有30平方米，不到北京房子的三分之一大，但她还是“恨不得现在就回去”。那里有老伴，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，有退休前的同事们，还有“自由”。

“还是家里舒服，北京太热了。”有的老人因为适应不了气候，会在酷暑或寒冬来临之前，像候鸟一样回到老家。

不敢生病

【“现在她能用上我了，我可高兴，没什么好抱怨的。”】

金秀琴的房间里有一个柜子，专门用来放她的药。扁平的白色药盒摆了好几堆。她长年患有糖尿病，每天需要吃三次药，每次吃三种。她在老家参加的“新农合”医保无法报销在北京看病的费用，每次去开药都要一下子买上好几个月的，用大号的尼龙袋装回北京。

金秀琴不敢生病，企图用各种方法逆转衰老。她听说曾经有位老人从西安到上海帮忙照料两个儿子的孩子，却在两个家庭的奔波途中突发脑溢血去世。前几年，她带外孙女去上游泳课时，自己在一旁也跟着学会了。之后几乎每周都要去三四次游泳馆，穿着女儿给她买的豹纹泳衣，一头扎进泳池。

陈显兰的儿女们告诉她，“您身体健康就是帮大忙了”。她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。

有数据显示，在老年群体患抑郁症的人群中，尤以流动老人居多。面对死亡，这些漂泊在外的老人有无数设想。有的老人在北京突发疾病，让儿女赶紧把自己送回老家，因为“不想死在北京”。有的老人已经为自己选好了墓地，希望葬在老家一处高高的山坡上，因为“喜欢热闹”。

但总有一个理由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留在北京。陈显兰的卧室跟女儿的卧室形成了一个夹角，她从屋里能看到女儿房间。有时老人在凌晨醒来，看到另一扇窗户还亮着灯，她骄傲又心疼。程丽云的儿子在一家软件公司上班，她偶尔过去，“就看见一排排小脑袋”。有的老人无意中看见自己拿到博士学位的孩子为了省钱买学区房，在喷泉旁边洗车，一下子泪流满面。

“身为父母，为了孩子我们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”陈显兰说。她种了一辈子地，没有退休金，女儿把平日给她的生活费都放到一个小抽屉里，看着快没了就放一些进去。家里困难，女儿结婚时他们没出一分钱的嫁妆，小两口买100多万的房子贷了90多万的款，他们也“一点忙也没帮上”，心里一直觉得愧疚。

“现在她能用上我了，我可高兴，没什么好抱怨的。”她说。

儿女不想让老人离开，有的老人提出要回老家，儿女把老人的证件和钥匙全部藏了起来。也有老人已经不适应老家的生活了。一位在北京居住了20年的老人说：“老家的房子太大，太空旷了。”在大城市住久了，他们会觉得家乡的街道突然变得脏乱拥挤，甚至陌生，连人情往来都成了负担。某种意义上，他们无论身在何处，都是异乡人。（受访者为化名）据《中国青年报》